

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主要发祥地:长安

张熊飞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儒家、道家和释家的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完整体系,均在长安问世,直接造就了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了汉字的起源与统一、学校的萌芽和起源、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道家和黄老之学的学术地位、“独尊儒学”的影响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分析认为:长安是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主要发祥地;挖掘、阐发、继承和创新长安优秀教育思想的精华,实乃当前教育改革的急迫任务。

关键词:长安;中华;教育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07-07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也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有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最早的教育场所,是在长安产生;“周公传之孔子”,中华文教事业的开创者、儒家思想的渊源,是在长安;“天下道林张本之地”,黄老之学居于显学地位,亦在长安。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教学方式,长安亦是源头;同时,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在长安出现;中国早期的国子监、中国完善的科举制度,也是在长安问世……

考古发现和文献剖析充分证明:长安是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主要发祥地。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优秀教育思想的历史传统仍在影响着今天的生活,制约着当今的教育,并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大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渊源。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通晓教育的历史。面对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面对中国教育界“言必称西方”、理论脱离实际以及不重视传授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等现象,实事求是地完成挖掘、阐发、继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任务,寻找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挖掘值得传承的精神内涵,以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整理、研究长安优秀教育思想及其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字的起源与统一

距今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以红底黑纹的彩陶为其特征。其后的龙山文化则以薄质坚硬的黑陶为其特征。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少数在底部或腹部,发现了许多与陶器上的花纹截然不同的简单而形状规则的符号,计有22种,115个,最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是Z字型。这可能是一些记事和计数的符号,无疑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应该是汉字的原始阶段。据此,郭沫若先生断言:“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距西安不远的临潼城北的姜寨

收稿日期:2012-01-13

作者简介:张熊飞(1938-),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遗址,是较半坡先民晚 1 000 年的仰韶文化,又含有龙山文化的内容。在出土的一万余件文物中,许多陶器上发现有种类繁多、笔画规整复杂的刻划符号,似乎已具有文字的性质。

早期的结绳、木刻和半坡的刻划等记事符号都不能完整地表达人们的语意。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主要表现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按《拾遗记》卷一:“黄帝……造书契。”^[2]“书契”即指文字。

黄帝之臣仓颉集前人之大成,根据“依类象形”和“形声相益”的原则创造出象形文字,其本身就是一种图画,比如“马”字最初就是画出马的形状;“车”字则是画出战车的形状等。仓颉加工整理了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最优美、最具活力、使用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字,说明长安是汉字的故乡,它为中国早期学校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记》曾记载,仓颉是今陕西白水县人,当地有仓颉墓和仓颉庙;仓颉为黄帝之臣或史官,故此地有史官村;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长里村旁还耸立着仓颉造字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汉初的识字课本有《仓颉篇》55 章,由《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组成,分别为李斯、赵高、胡毋敬所作。后来杨雄选用那些有用的字编《急就篇》,作为《仓颉篇》的续编,并将《仓颉篇》中重复的部分换掉,共 89 章、5 340 字,接着,班固又补充了 13 章,共 102 章、7 180 字。这些识字课本都是在秦朝“书同文”等统一大业措施中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字书颁布的。这样的课本寓政治思想、社会生活与自然常识于识字教育之中,既对推行统一的文字政策起到了重大作用,亦对两千年来的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至关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一切均表明:长安不仅是汉字的故乡,亦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书同文”的源头。

二、学校的萌芽与发展

半坡遗址发掘的所有文物都生动地证明了半坡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因此原始社会的教育便适应原始人群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3]。

半坡遗址以及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发现的遗址均规划整齐,密集地建造了四五十座房屋,中心有一间 160 m² 的大型房子,周围小房子的房门一致向着大房子。据考证,凡氏族酋长选举、氏族会议、祭祀鬼神、处理纠纷等都在大房子中进行,这些活动使孩子们自然受到教育。同时,老人对后代也在此进行

着生产技术、传统习惯及民主生活的教育。由此可见,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半坡遗址的大房子,是中国境内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教育场所,是学校的萌芽。

夏代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校者,教也”(《孟子·滕文公上》)。西周进入中国奴隶制的全盛时期,学校和商代一样,是典型的奴隶制“学在官府”体系。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形成了“天下失官,学在四夷”的局势,私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教无类”,人人均可接受教育。

随着封建制的产生,经秦、汉、隋等朝代的发展,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走到了封建教育发展的高峰,形成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相联系,官学和私学共存,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的经学性学校和以专科知识为教育内容的专科性学校并行的学校教育体系,成为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一种较为完备的封建教育制度,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直接影响此后各朝代的教育事业。而这一学校教育体系则发源于长安,形成于长安,发展于长安,完善于长安,这是长安教育的光荣。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既与生产劳动分离,又与社会政事分开,专门从事教育的学校是从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开始的。然而其教学形式“皆用口授”,只可称为“师授学校”。而“视简而诵”的“读书学校”起源于唐代的书院,它具有藏书、读书、教书等多种功能,乃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认识的主体是学生,从而成为中国学校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为此后学校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三、周公传之孔子

中国自汉武帝之后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家的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孔子也被历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而获得了许多至高无上的称号。

然而,儒家之所以兴起,正是由于学习和发扬了周公之学^[4]。《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顾儒者之学兴焉。”韩愈在《原道》亦明确指出:“周公传之孔子。”

周公姓姬名旦,谥文公,生卒年不详;系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母弟,又称叔旦。因其采邑在周地,故称“周”,又因其为太傅,系“三公”之一,故尊称周公。

从历史记载来看,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克己复礼”,推尊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他多次赞叹“周公之才之美”,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并将孔子与周公并论。荀子以周公为大儒,《荀子·儒效》就表达了对其尊崇之意。及至汉代刘歆、王莽称《周官》为《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朱子语类》就明确指出:“《周礼》是周公遗典也”,实乃是致西周于太平盛世的业绩。于是周公的地位便凌驾于孔子之上。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言孔子必及于周公,形成了“周孔之教”的传统观念。因此《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为:“武德二年,国子立周公、孔子庙。”此后《旧唐书·儒学上》记载:“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

从理论渊源来看,周公在文教方面最重要的创制是六艺之教,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以礼乐为中心,深浅相辅,文武兼备。春秋之后,发展为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名高级六艺,是古代高等学校采用的经典课本。这些典籍的编著大多起源于西周,经过长期广泛的传播、修订,然后成书。诸种珍贵典籍的创制都与周公直接有关。例如,古老的数学古籍《周髀算经》是周公六艺之中“数教”的课本。明代黄吟龙称“周公作九章之法,以教天下”,明末朱载堉认定该书为周公遗书;清代康熙称其为“成周六艺之遗文”。《周髀算经》中记录着周公与当时的大数学家商高关于勾股定理的对话,此时是公元前11世纪,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该定理要早几个世纪。到了唐朝则整理注释出“十部算经”,对唐朝以前的数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西周的“六艺”教育比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各国的教育内容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些成就是中国堪称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并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例如,两级、两类的学制,奠定了古代官学制度的格局;选贤贡士,开创了三千年来取士考试制度的历史;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六艺”教育,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耸立于这一时代思想高峰的周公是中国古代以“仁者爱人”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教育思想的前驱。

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披露了三千多年前周文王的临终遗言。这篇简文共有11支竹简,其中第二支竹简上半残失,但篇文大体齐全,名为《保训》。专家称,《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与儒家

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地不断发现,将会有更多实物证明周公是儒家的鼻祖。

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雄浑古朴,巍峨壮丽,其殿宇楹联书写到:

制大礼,作大乐,并戡大乱,大德大名垂宇宙;训多士,诰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艺冠古今。

由此可见,后人对周公怀念之深,推崇之至,这一切也充分表明儒家的渊源起于周公。周公不愧为中国古代儒学的先圣先师、华夏文教事业的开创者。

四、道家文化和黄老之学的学术地位

春秋时代,当老子李耳东来之时,被函谷关令尹喜挽留,望其传道解惑,老子将五千言《道德经》尽授于他,然后西去,不知所终。后来,尹喜和他所建的草楼观出名,道教形成,老子被奉为鼻祖,《道德经》成为开山之经典。草楼观所在地则被尊为“天下道林张本之地”,道教的庙宇称为“观”,亦源于此。历代帝王皆大兴土木,修建宗堂庙观:秦始皇曾筑庙以祀老子;汉武帝也兴建了老子祠,修缮了老子墓;唐代则是鼎盛时期,因同为李姓,唐王室尊奉老子为先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圣宫,并列为皇家禁地。各朝代的建筑屡有兴废,只有草楼观的台址不变,后来此地便得名“楼观台”。如今,楼观台地区仍留有清代修缮的老子祠、老子墓等遗迹。

被誉为“百家之祖”、“万经之王”的《道德经》,不仅对其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风靡欧美,包括康德、黑格尔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哲学家均借此获得灵感和观点。这恰恰表明《道德经》是唯物辩证法的渊源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从中寻找拯救西方文化没落的良方,难怪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据学者统计,《道德经》的版本有三千余种。近几年,修订后的楼观本已广为流传,将继续凸显其应有的学术辉煌。大道无名、大道无为、大道和谐、大善若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大爱无疆等等,“道法自然”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不仅影响着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和教育,在当前也是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之一。现在以楼观台为中心修建的旅游圣地,则成为以文化为标志的国际化大都市——西安的又一亮点。

让我们再来看看道家与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创

新!春秋时代,大致形成以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家等学派为主的“九流十家”,彼此各自立说,各抒己见。学术的争鸣必然带来融合,而兼容的同时就会有创新。

战国中后期,黄老道家学者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吸收法、儒、名、阴阳等家的教育思想,提出一整套关于为政治国、施行教化、个人修养的理论,其融合与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使其他学派望尘莫及。从解读《黄帝四经》可以看出其主要表现在“援法入道”和“援儒入道”2个方面,并且遵从人性,因性成教,形成了重虚静体悟的道德修养和学习理论,其教化实施方案中隐藏着“无为而治”和“不言之教”的精神实质与美好追求^[5]。

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经法》、《经》、《称》和《原道》4篇古佚书,被唐兰先生认定是《汉书·艺文志》所列的《黄帝四经》。经大量深入的对比研究发现,道家黄老学派在战国中期以后,成为当时时代主流,而居于战国至汉初数百年的显学地位。汉初在教育方面,学习和传授黄老之学十分发达,从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来看,黄老帛书与竹简,即《黄帝四经》与《老子》抄在一起,已是汉初贵族子弟的读本。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汉墓出土的大量竹简中有《文子》一书。黄老之说存在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

《淮南子》虽然素有杂家著作之称,不过这种“杂”正是黄老之学兼融各家思想的表现。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就指出,《淮南子》是西汉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其实,撰写该书的8位主要学者,都是黄老学派。所谓“黄老”,王充讲得比较清楚:“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论衡·自然篇》)。黄老之学尊奉黄帝,假皇帝以立言,实则在于老子。在先秦道法合流的基础上,到了汉初,则兼融各家思想,并注入时代精神,兴盛一时,汉初又名黄老刑名之学或新道学。汉初直至景帝,都坚持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本,“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帝(景)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这就造成黄老学派在汉初大盛的局面。

可见,先秦黄老之学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教育思想某些特征和内容最早的观念渊源,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不仅对先秦儒学集大成者荀子和汉初儒家诸学者的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即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深受熏

陶,直接采用了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德行相辅”等思想。

东汉以降,黄老学说发生分化,其中一支专门研究《老子》学说,称之曰老子之学,并以讲学的形式在民间获得继续发展(《后汉书·杨厚传》)。另外,还分化为养生养性之学、宗教神学等,道家思想又以世俗化形式得到传播^[6]。

儒家伦理、道家生命哲学和释家宗教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体系。释家是吸纳、创新外来文化的成果。随着春秋时期其他学派的相继消失,道家的教育思想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潜存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这使我们领悟到:关心社会的儒家,倡导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倾心自然的道家,则倡导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儒道融合,相得益彰,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在中国政治、教育、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中到处可以看到它们的深深烙印,黄老之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渊源之一,《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必将在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征途中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而值得一提的是,儒道的渊源均在长安。

五、“独尊儒术”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虽然“罢黜”和“独尊”并非如此绝对,但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儒学处于正统地位的局面才宣告结束。在这漫长的岁月,儒学既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7]。

儒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既宣扬“尊君”,又强调“重民”,主张推行“仁政”,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将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涂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又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儒家既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化的论证,又以“人之常情”的纲常名教、风俗习惯,富有“人情”味地为统治者提供了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有助于缓和阶

级矛盾,在实践中却起到了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证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这表明了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在于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适应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需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之国策,而为历代王朝所青睐。“和为贵”的思想一直影响到现代和将来。

儒家把“以教为本”作为德治论的核心,宣扬“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教育被社会公认是“为政之本”,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教育在历朝历代的发展。同时,儒家以纲常名教化民易俗,促成了伦理道德教育,保存了一些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良好道德传统,并与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密切结合,对于形成中国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良风美俗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精神生活却显得贫乏甚至混乱,就连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节日,也逐渐被时尚而喧嚣的西方节日所代替。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文化大国的地位却让人困惑,甚至深感渺茫,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被全球化的、传媒化的、同质化的流行文化所淹没而断裂。这种社会现实已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如果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再不确立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难以真正实现。

因此,认真研究传统儒家思想的正面影响、积极意义和宝贵经验,彻底转变知识界充当西方话语的传播者形象,摒弃当前国学热中某些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还孔子、老子等文化巨人以本来面目,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道德教化等方面,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从价值判断上给予充分肯定,并从整体上扬弃儒、道等中国文化传统,既反对虚无,又防止复古,把理性的吸收与现代化转化紧密结合起来。其实,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吸收了包括儒、道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国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通融性,实乃学术界、教育界的当务之急。同时,更要采取切实措施,让理性融合到中华儿女的一切日常生活中去,提升炎黄子孙的文化自觉性。

同时,我们再进一步剖析传统儒家思想的消极一面。自实行“罢黜”、“独尊”方针之后,先秦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学术高度繁荣的局面消失了。

虽然由于黄老之学道家学说曾一度兴盛,而与儒学结合仍然传承不绝之外,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和以名辩著称的名家以及其他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学说均销声匿迹了,从而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汉代尊崇儒学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汉唐时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宋元明清时代,有许多诵读儒经的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都表明儒学并不妨碍自然科学的进步。但是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学者始终没有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引导。加之儒学独尊,造成了汉代学官制的狭隘,天文、算学、地理、水利、农学等都不能立于官学,限制了学术发展的道路。唐宋实行科举制度,以辞赋或经义取士,明清更以八股取士,使广大知识分子耗精疲神于无用的虚文,更是阻塞了自然科学进步的道路。由此造成15世纪以后,当西方文明突飞猛进时,中国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近代实证科学。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就了世界列强的利炮坚船,用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这正说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长期落后与儒学独尊有着一定的关系。

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必须发扬春秋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决不能再搞“独尊”。中国历史上群星灿烂,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孙子、韩非子……以及众多的诗圣词祖,文学巨匠,等等,真是“诸子百家”,都应该放射出应有的光辉。

长安既是儒家鼻祖的故乡,又是道家理论的源头,不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吗?

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具体内涵

谈到长安教育,不能不说起那些曾经出生或从政于长安的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家:不仅有华夏文教事业的鼻祖周公、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匠司马迁、千古师表韩愈、中国古代第一位女教育家班昭、宋代关学的奠基者张载、最早向西方学习的教育家王微等等。还有一批虽未留下教育专著,但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帝王将相,如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商鞅、李斯、张九龄等;他们的理论或实践给后世留下了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为我们今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教育事业提供了丰富的渊源。本文以下略举数例。

长安教育家普遍认为,凡治国之道,首先在于实行教育,教育居于治国安邦的首要地位;教育兴则百业兴,教育殆则百业殆。人才对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也就是说,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各级各类有用的人才。人非生而知之,乃靠后天的教育而成长。人性是后天形成的,它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可因接受教育之不同而发生转移:“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不流动)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傅子·附录》)。因此,长安教育家们都十分重视识别、培养、使用人才。国民教育是文化强国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古今是一脉相承的。

堪称“道德之主”的周公十分成功地实施了“敬德保民”的教育措施,把表达价值观的“礼”教置于“六艺”之首,并为孔子所继承,形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道德至上论。并从教育目标上要求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杜佑提出,“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通典》)。长安教育家对培养人才的规格,既主张德才兼备,又强调修德是造就有实际本领的英才,使其形成理想自由人格的重要途径,把德放在才之上,以德帅才,以才充实、表达德,并突出“修身慎独”,给后人留下了优秀的教育传统。

韩愈总结前人论述,撰写《师说》,集中地论证了“尊师重道”,并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能的首位。“道”是一种哲学范畴,在社会实践中则是人生的理想境界,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最高信仰。只是“道”即理想与信仰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而已。此后的长安教育家无不坚持“德教为先”的原则,反复告诫教师要成为“道”的使者、“道”的化身,以“传道”为己任。他们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西周的教育内容从德、行、艺、仪4个方面逐渐形成了课程体系,称为“六艺”。先秦儒家则发展为“六经”,其中最重视诗和礼,“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历经秦汉,到了唐代,官学课程体系更为严密,分为正经9种、旁经2种,还要作时务策、练习书法,有的还专修道家经典。专科学校学生则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并研习儒家经典等。这种重视建立系统完整的课程体系,给我

们以极大启示。

西周“六艺”的学习,把“示范”和“模仿”紧密结合。不仅实践性强的“射”,要先“诱射”再模仿比赛,就是学“礼”也不是单纯地讲授礼典,而是在教师引导下,注重让学生反复“演礼”,以求达到合乎规范的目的。这种注重在实践中让学生学习课程的方式启示我们:教学过程既要重视传承性课程,使学生掌握优秀的文化遗产,更要重视体验性课程,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的全面和谐发展,从而在教学中认真落实课程改革所提出“自主、合作、探究”的基本理念,并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实践化,这对于当前培育开拓型、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8]。

西周对家庭教育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华教育的基因。甚至还注意到胎教的重要性,如《列女传·周室三母》明确指出,文王之母大任,“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恶言,以胎教也”等。

至于在学习和教学方面,更有着极为丰富的优秀遗产。“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学习格言。学业、事业要“精”,就必须勤奋钻研;德行、行事要“成”,就必须独立思考。这确是长安教育家共同的治学经验,指出了人才成长的根本途径。

在学习方面,长安教育家还有着许多优秀的论断,“立志成趣”、“学须有恒”、“学贵自得”、“学善质疑”、“博学专精”、“融会贯通”、“不耻下问”等,均成为中华教育的至理名言。在教学方面,长安教育家同样有许多优秀的传统观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善为人师”、“以身作则”、“人格感化”、“潜移默化”、“教学相长”、“情境教学”等,均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财富。

教学是教与学的矛盾统一体。长安教育家特别强调:“学与教皆学也”(张载《语录下》)。也就是说:教是通过学而实现的,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得再好,没有落实到学,一切皆是空的。教与学的和谐关系是教学论的核心问题;正确认识教与学的各自职能及其辩证统一关系,是教学论的基础理论。这对于当前课堂教学改革尤为重要。

七、结 语

以上6个方面,可以说是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根本基因。这为建设以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西安,提供了一个新的渊源。我们学习这些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必须坚持扬弃的科学原则,注意掌握其精神实质,以形成合乎时代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进学解》批判了当时“耻学于师”的社会陋习,又一直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天职,功不可没。时代发展到今天,就暴露出它的片面性:如果仍然单纯地强调“传道”、“受业”、“解惑”,就必然成为一部分教师片面地坚持“老师滔滔讲,学生默默听”的注入式理论的依据,直接影响着开拓型、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为了落实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所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基本理念,必须扬弃韩愈的观点,仍采用他凝练的格言形式,将教与学各自的职能比较全面地阐述为:师者,所以引路、开窍、

促进也;学者,所以体验、探究、创新也。西安正在重振汉唐雄风,长安教育思想的优秀传统必将放射出应有的灿烂光辉。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2] 张岂之. 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 [3]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 中国古代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
- [4] 李钟善,陈敏钰,张安民,等. 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5] 米靖. 论先秦道家黄老学派教化观的特点和影响[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23(6):20-25.
- [6] 黄留珠. 汉代黄老政治述论[J]. 三秦文史,2002(1):1-6.
- [7] 张岱年. 汉代独尊儒术的得失[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2):1-4.
- [8] 张熊飞. 用全新的课程观关照课堂教学[N]. 中国教育报,2008-03-16(8).

Main birthplace in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s: Chang'an

ZHANG Xiong-fei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and complete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ade up of Confucian school, Taoist school and Buddhist school, all of which were born in Chang'an and forme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ed documents and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un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rudiment and origin of schools,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thought in earlier Qin Dynasty, the academic positions of Taoist school and learning about emperor Huang and Lao Tzu, influence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e spe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hang'an i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earch, explicate, inherit and create its essence at the present educational reforms.

Key words: Chang'an;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 creation